

绪 论

恽代英（1895—1931），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楷模”。作为武汉地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他也是武汉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驱。祖籍江苏武进，1895年生于湖北武昌，1913年就读武昌中华大学预科班，开始接触无政府空想社会主义。1917年组织了爱国进步的互助社。1918年留校在附中任教导主任。1920年创办利群书社，并加入旨在“创造少年中国”的少年中国学会，编辑《少年中国学会丛书》，大力传播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进步社会思潮，同年翻译了考茨基的《阶级争斗》，该书对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董必武、许继慎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深刻影响，促进了他们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1921年在湖北黄冈组织了具有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共存社，随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3年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中央委员和宣传部长，并创办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该杂志成为青年们最喜爱的进步刊物，培养了如陆定一、张宗适、胡秉铎等整整一代青年。1926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任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国共合作破裂后，他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最早认识到武装

斗争重要性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历任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六届二中全会中央委员。1928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并主编《红旗》，因为反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而受到党内排挤，被调往危险的白色恐怖地区工作。1930年5月6日在进行秘密地下工作时被捕，1931年4月29日由于叛徒顾顺章的出卖，牺牲于南京。恽代英同志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曾以“代英”“子毅”“子怡”“但一”“FM”“稚宜”“天逸”“尹子怡”“毅”“遽轩”“戴英”等笔名撰写了大量文章，为世人留下了300余万字的宝贵文化遗产，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设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是中华民族珍贵的精神财富。

一、恽代英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回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一个热点，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上的一个核心问题。学界对此论题的探究可谓汗牛充栋，热闹非凡。迄今，已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著达百余部，论文8613篇（笔者根据孔朝霞的博士论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研究》中收集的数据，即截至2009年下半年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文6900篇，加上中国期刊网检索出的2010年至今的相关文章1713篇，综和而来。以下都用此办法），足见其关注之热切、争论之热烈。目前，代表著作有：宋士昌、衣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梅荣政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庄福龄和邱守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第1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郭建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沿问题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张雷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版)、刘德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郑永廷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柳国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邓剑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田克勤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龚育之、石仲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侯惠勤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 30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程恩富的《遵义会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陶德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等。

特别是 2009 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新命题,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不管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质的变化。2010 年至今是该领域学术研究的丰收、高产时期。据中国知网不完全统计,近 3 年来出版的专著近百部,远超过前十年的总成果,发表的论文 2401 篇。迄今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述评约 19 篇(按上文的办法)。其中,汪信砚的《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述评》是梳理该论题之力作。他总结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规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条件与社会文化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术史等纷纷进入学者们的视野,成为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主要论题”,而“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最热论题仍然是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①问题。

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近年来党史界对创建史研究的一个拓新。近几年,研究界逐渐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延伸到建党领域。基于党的创建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初步结合的时期这样一个共识,学术界开始有意识地探寻创建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联系。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基本上是将其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视域下审视,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专著,均有这方面的记载,但多是一般性的描述,彼此重复,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薄弱环节。迄今仅见专著4部:彭继红的《传播与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1899—1921年)》(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王继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与启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王增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和宋镜明、吴向伟的《党的重要历史人物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以1993年左玉河、王瑞芳的《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载于《史学月刊》,1993年第1期)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的起点,至今论文52篇(按上文的统计办法),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的6‰。通过梳理和比对,主要内容有如下几点:

第一,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研究。这个论题探究最热门。王先俊、曹名臣的《党的创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较早地探究了这个问题,论文指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三个特点:一是党的创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相伴而行的;二是党的创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受共

^① 汪信砚:《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述评》,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3期,第81页。

产国际的影响；三是党的创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一定的自发性。^①之后的相关论文大多借鉴该文，没有重大突破。姚锡长的《略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特点》认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具有四个特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宣传和研究；在列宁主义直接指导下的共产国际的帮助；对国情的探索和对民主革命任务探索的互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步全面应用的实践性。^②论文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基础，即实践性特点，用实践的思维范式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特征，客观上扩大了视野。

第二，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交锋研究。这个领域的研究较深入，并有一定深度。相关论文主要阐明思想交锋促进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思想交锋的必然结果。周良书的《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到“理论与实践”之争：关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考》，围绕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李大钊与胡适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和张国焘与李汉俊之间的“理论与实践”之争，进行了较全面深入的探讨。作者认为论争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促成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这具有深远的意义。但在论争的过程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非此即彼的态度，也给党的理论建设造成了负面影响”^③。应该说，该评价是客观而中肯

① 王先俊、曹名臣：《党的创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载《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3期，第34页。

② 姚锡长：《略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特点》，载《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6期，第79页。

③ 周良书：《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到“理论与实践”之争：关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考》，载《科学社会主义》，2008年第3期，第53页。

的,作者从新文化发展的角度诠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思想交锋的必然结果。

王明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萌芽》,认真探究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作者认为“问题与主义”之争,造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萌芽。论文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辩证地分析了胡适与李达的争论客观上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推进了早期先进知识分子有意识探索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的“实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发展提供契机。

宋连胜、侯建明、丁刚的《“社会主义论战”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为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社会主义论战”,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论文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论战带来的结果是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指明了革命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论战虽然对中国的国情认识还不够准确,但提出了可贵的结合中国“实境”的学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推动作用。^①

第三,关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起点与标准研究。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问题,学界争论较多。迄今已产生了20多种说法,按照历史顺序大致有“马克思主义传入之日说”“李大钊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说”“中国共产党二大说”“八七会议说”“《反对本本主义》说”“遵义会议说”“六届六中全会说”“延安整风运动说”等等。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界定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还需进一步思想交锋、迸发火花。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准问题,也存在一定争议。以张远新、张正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新探》(以下简称《新探》)和张世飞的《论马克思主义中

^① 宋连胜、侯建明、丁刚:《“社会主义论战”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载《理论学刊》,2008年第6期,第13页。

国化的历史起点与形成标准》(以下简称《标准》)之间的争鸣为典型代表,《新探》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准须具备:“(1)‘谁来化’(2)‘化什么’(3)‘为什么化’(4)‘怎样化’(5)‘化’的社会历史条件”。^①《标准》则对上文提出质疑,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准主要有两个:“一是李大钊等人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水平;二是其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实际贡献。”^②尽管学界争论热烈,但未形成定论。

值得一提的是,田子渝、蔡丽、徐方平、李良明著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出了新的见解,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准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该著作明确地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主要标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形态。著作明确定义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即“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方法论来明确认识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初步掌握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与规律。因此其标准至少要具备这两条:一是要有比较丰富的中国革命实践,二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具有‘中国理论形态’”。^③该著作也给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标准:实践和理论标准。这些为深入探究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建构奠定了重要基础。

以上简要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

① 张远新、张正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新探》,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6期,第100页。

② 张世飞:《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与形成标准》,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8期,第138页。

③ 田子渝、蔡丽、徐方平、李良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北京:学习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化的现状，我们不难发现，相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而言，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仅是一枝含苞待放的花蕾，还未结出丰硕的果实，因此还有许多弹性空间等待后人来挖掘。鉴于实际，我们需要从源头上厘清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什么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什么要进行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以及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哪些重要内容，等等，这就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研究。目前，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艰难的探索，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本思想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体智慧成果。恽代英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理论家、革命家和杰出的青年运动领袖，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值得学术界进一步研究。武汉地区一直是国内研究恽代英的重镇，在以华中师范大学为中心辐射开来的恽代英人物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该校曾先后于1985年、1995年、2005年和2015年承办了恽代英诞辰90周年、100周年、110周年和120周年学术讨论会，收集了海内外数千余篇论文，不仅进一步推动了恽代英人物研究，而且繁荣了党史研究。据笔者统计，自恽代英牺牲至今共出版专著18部〔《恽代英研究篇目索引》（以下简称《索引》）中的15部，加上2006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的《纪念恽代英诞辰11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1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恽代英思想研究》和《纪念恽代英诞辰12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海内外论文423篇（《索引》里的409篇，加上笔者搜集近两年的论文14篇），研究述评7篇。应该说，恽代英研究果实丰满，成绩显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工具性书籍《恽代英全集》（李良明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的问世，基本穷尽了恽代英所有著述，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早期党史人物遗著收集、整理的空白。著作有9卷，

共290余万字，收录了恽代英1914—1930年间所写的论著、日记、通信、译作、教材、报告、演说等共600余篇，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恽代英的思想体系，彰显了恽代英研究的史料价值。

恽代英研究专家李良明的《恽代英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是目前该领域的前沿著作，全面梳理了恽代英300余万字译著以及国内外恽代英生平和思想研究成果，作者从历史背景、社会实践等方面实事求是地论述了恽代英在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领域的理论贡献，代表了学术界在该历史人物研究上的较高水平，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作者指出，“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恽代英思想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成绩斐然。”^①但“在恽代英思想研究的论文中，关于他五四时期思想的研究较多，大革命时期和大革命失败以后的思想研究较少。从《恽代英研究篇目索引》可见，我国学者现有研究主要是探讨恽代英五四时期政治思想的发展轨迹，以及少数关于他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编辑思想、文化思想等方面的研究……日本学者、美国学者的论文也都是研究恽代英早期思想的”。^②这段话提示未来恽代英思想研究的方向，即深入挖掘恽代英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思想动态，直至他1931年走完人生最后的那段思想历程。

把恽代英最后十年的奋斗历程和思想发展轨迹置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初步结合的历程来考察，恽代英的革命历程浓缩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初步结合的曲折艰难发展历程，他的革命生涯就是早期马克思主义

① 李良明：《恽代英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页。

② 李良明：《恽代英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7—38页。

中国化的一个缩影。这为恽代英思想研究打开了广阔的空间，展现了多维度的思维范式，为之纵深发展提供可能。《索引》检索表明，自恽代英牺牲至今，记述他最后十年的革命生涯的论文 55 篇，仅看见 1 篇有关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文章。《湖北党史人物对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贡献——以董必武、李汉俊、恽代英为例》是最早论述恽代英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贡献的文章，论文从把书刊报纸作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具，创办学校、社团和工人夜校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参与革命实践四个方面来介绍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①但囿于构思，作者对恽代英具体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没有涉猎，但仍不失为一篇角度新颖的佳作，值得圈点。

宋镜明、吴向伟的《党的重要历史人物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第一部专门论述党史人物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作，它用专题形式从传播马克思主义、对国情的探讨、农民问题和党建问题的角度入手阐述了恽代英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然而囿于布局，作者浅尝辄止，未对恽代英的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进行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扫描与挖掘，但对本课题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有较高的借鉴价值。李良明、李天华的《恽代英政治思想研究》[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5 期]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来简要阐述其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本思想，其“成为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元素，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奋斗征程的指南和经验总结，为党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毛泽东思

^① 丁俊萍、徐信华：《湖北党史人物对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贡献——以董必武、李汉俊、恽代英为例》，载《湖北社会科学》，2008 年第 2 期，第 11 页。

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①。他们在《恽代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载于《江汉论坛》2015年第3期）一文中用最新的史料来论证“恽代英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领导人和理论家之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过重要的开创性的贡献”^②。

海外恽代英研究主要在美国和日本。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最早把恽代英介绍到西方。“对恽代英的生平和事业介绍得比较详细的著作是1971年出版的两本英文工具书，一本是美国人霍华德·布尔曼（Howard Boorman）和理查德（Richard Howard）编写的《中华民国人物词典》，另一本是唐纳德·克莱因（Donald Klein）和安妮·克拉克（Anne Clark）编写的《中国共产党人物传记词典》。”^③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夏海的博士论文《五四时期恽代英及其湖北的朋友》专门研究恽代英早期思想；在日本，狭间直树的《五四运动的精神背景——对恽代英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历史评价》（《广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和后藤延子的《恽代英在五四前夜的革命思想》（日本信州大学《文学部集》1983年第16号）都是关注恽代英的早期思想，但是海外对恽代英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的思想关注较少。

近两年，学术界开始有意识地把恽代英纳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① 李良明、李天华：《恽代英政治思想研究》，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57页。

② 李天华、李良明：《恽代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载《江汉论坛》，2015年第3期，第61页。

③ 钟德涛、张亮东：《纪念恽代英诞辰11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

的研究视角，但仍处于起步阶段，有待进一步深化。迄今仅看见2篇相关论文：薛志清的《恽代英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湖北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和李中祥、曾冰的《恽代英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国论题——兼论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本经验》（《湖北社会科学》2011年第11期）。薛文较前者就深刻得多了，他较为系统地概括了恽代英在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的思想认识轨迹，论述了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见解，并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作斗争，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薛文的着重点在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上，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述较薄弱，仍属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研究的范围。李文主要从恽代英转变成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用唯物史观的视域来分析中国社会革命从中得出的经验来探讨恽代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

从现有的恽代英研究成果来看，学术界对其研究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对其生平事迹研究的论文较多，对其思想研究的较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学术界大多以回忆录的形式，具体介绍他的辉煌岁月，缅怀革命烈士；改革开放以来，学界仍较为关注恽代英生平，较多地描述他的革命生涯，尤其对其青年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等革命活动记叙较多。以恽代英的妇女运动为例，他的婚恋经历甚为传奇，学界大多是记录他的婚恋经历，如：王学亮以文学纪实的形式分期发表了《恽代英与沈氏姐妹花的传奇婚恋》上、下篇，鲜见妇女思想研究。目前，仅看见4篇相关论文：田子渝的《恽代英与妇女解放》（《妇女研究资料》1986年第1期）、赵忠心的《恽代英的家庭教育思想》（《教育研究》2001年第2期）、王冠中的《恽代英婚恋家庭观念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和马正平的《恽代英妇女思想研究》（《甘肃理论学

刊》2012年第2期)。可见,欲使其纵深发展,还需要进一步拓展系统研究。

第二,对其早期思想研究的较多,对大革命时期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思想研究较少。改革开放以来,对恽代英早期政治思想研究曾经有一个争鸣的高潮阶段,就是20世纪80年代掀起的关于恽代英早期政治思想性质问题的争鸣。集中体现在胡长水先生的《再论恽代英早期政治思想的基本倾向——答李良明同志》与李良明的《恽代英是走着由无政府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吗?——与胡长水同志商榷》、田子渝的《论五四时期恽代英政治思想的主流》等的学术论争,加之日本学者对该问题探讨兴趣浓厚,亦加入到该阵营,使恽代英早期政治思想研究达到了较高水平。然而大革命时期及之后的政治思想研究远没有早期思想论争激烈、研究深入,因此,深入探讨这个时期的思想正是笔者尝试拓展的层面。

第三,对其个体研究较多,个体与个体以及个体与群体之间的比较研究较少。李良明曾评价道:“对恽代英生平事迹及思想的研究,还单纯地停留在对恽代英个体研究方面,个体研究较多,而个体与个体比较研究以及个体与群体比较研究少,甚至可以说关于恽代英的比较研究至今阙如。”^①的确,从《索引》和笔者收集的资料来看,恽代英的比较研究仅有5篇,而且仅只把恽代英与毛泽东进行个体比较,恽代英与李达、蔡和森、李达等个体比较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因此,著作力图运用比较研究法综合比较恽代英与其他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异同,以凸显恽代英的个性特色,并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画面着色。

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恽

^① 李良明:《恽代英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8页。

代英研究以及恽代英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成果汇总（详见下表）：

表 1 1979—2016 年统计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恽代英研究	恽代英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专著	300 余部	4	20	0
论文	上万篇	60 余篇	500 余篇	6
述评	50 余篇	2	10	0

数据来源：中国期刊网和《恽代英研究篇目索引》。

从表中可以看出，恽代英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十分薄弱的，还未结出丰硕的果实。因此，这为后人从事恽代英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契机，同时这也是本书研究的起因。

二、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标准及历史起点

弄清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标准问题，是本书首要解决的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既是行文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这里作专门探讨。

界定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是研究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提。所谓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就历史起点而言）最初相结合的实践活动与理论成果。关键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最初、实践活动与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之源；中国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唯一客体；最初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显著特征；实践活动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和归宿；理论成果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

义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事业相结合的话，那么，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革命实践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更进一步地同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革命实践、革命历史和革命文化结合起来，不断创新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成果。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两个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在民主革命时期成熟的标志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完整提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现的“中国特色理论形态”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思想的雏形。这里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体征，即“化”的核心：“中国特色理论形态”，它体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价值，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体征，因而是最重要的标识。

根据上面的标准，特界定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所谓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有马克思主义传播，但只是初步传播，换句话说，仅是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要有一定的实践活动，但实践并不丰富，因此对中国革命的规律没有完全掌握，只能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本思想。其具体内容包括：对中国特殊的二元社会与中国特殊的革命性质的认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革命的领导阶级、主力军、同盟者，对资产阶级的认识；党的革命策略和党的建设等。毛泽东指出：“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人民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①这说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页。

对马克思主义具体结合中国革命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深化过程，对中国革命规律的把握也有一个从局部到整体的阶段。因此，此时的党还处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段，仅是探索出毛泽东思想的萌芽——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本思想，这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发展、完善阶段还存在较长一段距离。因此，把“中国特色理论形态”的雏形阶段称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肇始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因为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上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基本规律做出了最初的探索，彰显了中国特殊的基本元素。

根据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定义，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准必须具备这四项条件：一是思想条件，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是思想前提。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的理论来源，如果没有这个思想条件，就无所谓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是别的思想、理论、主义的中国化了。

二是主体条件，即有中国共产党作为主体条件，这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物质力量，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承接者，也是传播者，更是实践者。

三是实践条件，即需要与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实践。实践条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重要指征，自然也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衡量标准，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渐变的实践指征。

四是理论创新条件，即要有中国特色理论形态。是否具备彰显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理论形态”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标志和最重要的条件。所谓“化”主要就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产生的理论成果，如果没有理论形态，那只能是实践自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低级形态，“中国特色理论形态”才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级形态，而且它具有可操作性，往往成为衡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标准。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二大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结晶——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标志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完整提出，而中国共产党二大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本思想的雏形，初步产生了“中国民主革命特色理论形态”基本元素，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开启。其主要包括以下三点内容：

第一，确定了中国特殊的社会性质，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二元社会。正确地判断社会性质是制定正确革命战略的客观依据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二大在《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首次使用了“半殖民地”一词，使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性质的认识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在经济秩序毁坏了中的世界资产阶级，又企图劫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原料劳力，来补偿他们在大战中的损失”。^① 二大宣言断定了中国“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帝国主义的列强在这八十年侵略中国时期之内，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共同的殖民地了，中国人民是倒悬于他们欲壑无底的巨吻中间。帝国主义者掠取了中国辽广的边疆领土、岛屿与附属国，做他们新式的殖民地”。^② 不管是“共同的殖民地”提法，还是“新式的殖民地”用语，这些措词都无一例外地揭示了中国社会半殖民性质的规律，即在经济上，列强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拥有我国的修路权、采矿权、办邮电、关税权等，“国际帝国主义在相当的期限以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35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67页。